

专 论

## 新自由主义与世界经济危机\*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

**【内容提要】** 2008—2010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并不单纯是由美国次贷市场的崩溃所引发的，其根源深植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目前现存的国际制度体系与其说有助于全球秩序，不如说催生了全球混乱。应该从根本上重建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所赖以运行的制度架构。未来世界的经济，即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需要的是能够进行包括政治在内的全球协调的制度。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 经济危机 合力理论

**【中图分类号】** F1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0)02-0003-(9)

一切如此发生的原因在于许多事情不约而同地发生了。这句看似主题词重复的话，其核心思想是以我所谓的“合力”（Theory of conjunctures）理论为基础的。虽然原则上讲，这一理论更多地适用于对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进程的实质与机制的解释，但用它对其他情形加以解释也相当有益，比如用以解释2008—2010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原因和机制。这一危机大多数时候都被框入该时间范围，虽然它的根源远早于2008年，而要真正感受它的“结果”也会远迟于2010年。

### 现代危机的特点

我们面对的是远比普通意义上暂时性的经营受挫和传统以GDP衡量的生产绝对

\* 2009年9月25日俄罗斯联邦政府附属财经学院学术委员会决定授予科勒德克“名誉博士”称号。本文系科勒德克于同年10月30日在该学院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举行的授位仪式上所作学术报告。经作者授权，本刊独家中文发表。

\*\*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波兰前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华沙科兹明斯基大学转型、一体化与全球化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下滑更为严重的危机。而且，我们应该用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指标衡量体系来替代 GDP<sup>①</sup>。

这是战后世界范围内影响最为广泛的危机。然而，无论是在思想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都不能简单地把这次危机看作是生产的暂时下滑。危机还在持续，因为它超出了狭隘的再生产范畴。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危机已经结束，因为在 2009 年第四季度世界生产出现了增长。然而遗憾的是危机还在持续，因为它远远超出了狭隘的生产范畴。

我们在商业环境得以改善且经济增速相当可观的条件下开始进入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世界生产总值 (Gross world product, GWP) 在这十年的前 3 年里增长 9.6%，年均增长 3.1% (2001 年、2002 年和 2003 年分别增长了 2.4%、3.0% 和 3.9%)。后期这种加速度仍然存续，特别是危机前的 3 年时间。2005—2007 年 GWP 甚至增长了 15.5%，即年均增速超过 4.9% (2005 年、2006 年和 2007 年分别增长 4.9%、5.0% 和 4.9%)。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地球人口超过 60 亿，比 1960 年高出 2 倍，比 2 个世纪前高出 3 倍，并且是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的统计最高水平<sup>②</sup>。接下来的 2008—2010 年 3 年间出现了衰退和危机性的崩溃，GWP 仅增长了 4.9%，即年均增长 1.6% (2008、2009 和 2010 年分别增长了 3.0%，-1.1% 和 3.1%)<sup>③</sup>。也就是说，3 年的危机仅相对于危机前 1 年的增长。这样的指标说明人均生产增长率仅徘徊在近似停滞的年均 0.5% 的水平。

局外人一定会问：为什么要对 2009 年仅 1 年间区区 1% 的生产下降这么大惊小怪？毕竟在 10 年内增长 40% 的大背景下，1% 的下滑如果不说可以忽略不计，也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此外道琼斯指数在 2009 年 10 月中旬就已拉升到了 10000 点以上，那也就意味着可以跟危机说再见了，因为股票市场行情再一次验证了增长。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为什么？

首先，上述逐年列出的数据涉及的是全球 GWP 平均水平的变化。而这个世界非常多样化。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足以证明，如果说这十年的前 3 年世界生产年均增

---

① 在《运动中的世界》一书中，我建议了另一种反映经济运行与发展的指标，即所谓的“综合成功指数” (IIS, Integrated Index of Success)，其中 GDP 只占总量的 0.4。其余的 0.6 分配于闲暇时间、健康状况、收入分配、文化价值主观评价、生活质量及自身社会资本认知之间。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主导创立的所谓“斯蒂格利茨—森—费图西委员会”的报告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Sorbonne, Paris, 14 September, [http://www.stiglitz-sen-fitoussi.fr/documents/rapport\\_anglais.pdf](http://www.stiglitz-sen-fitoussi.fr/documents/rapport_anglais.pdf)) 也在朝着类似的方向发展。该报告于 2009 年 9 月 14 日在索邦召开的研讨会上发布。现在整整一代人会为诸如 IIS 及 2009 年年度报告所提出的合理化建议的贯彻实施进行政治、思想和方法论的斗争。

② 简单而言，可以设想，按人均计算，增长率略低于 1%，而同期人类增长的速度则略高于 1%。

③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ustaining the Recovery*, World Economic and Inancial Survey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October, 2009.

长 3.1%，那么对于富裕国家而言，即那些不足 10 亿人的最发达经济体<sup>①</sup>，这一指标仅为 1.6%。而生活着 58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sup>②</sup>，该指标为 4.3%。世界经济体系正在发生变化，而且是朝着好的方向，因为历史发展进程遗留下来的高度发达国家与相对落后国家之间巨大的生产和生活水平差距在缩小。危机加快了差距缩小的速度，应该承认这是件好事。如果说在 2000 年中国的人均 GDP（如按照购买力评价来计算，PPP）只相当于美国的 6.7%（即 PPP 调整后的 2377 美元对 35252 美元），那么在 2010 年这个对比关系将达到 15%（即 PPP 调整后的 7200 美元对 47400 美元）<sup>③</sup>。

其次，目前的这场危机，与其说是生产危机不如说是再分配危机。事实上，尽管 GDP 的波动很明显，但包括消费和投资绝对规模在内的波动更为剧烈。区域和部门的差距同样巨大。西欧比北美遭受了更为严重的破坏，而东欧的损失比西欧还大。谈及危机对美国分配领域的影响，华尔街比“蓝领街”（Main Street）更为敏感，即金融部门比雇工和打工仔更为敏感。换句话说，这次危机对白领的影响要蓝领大。危机对汽车工业的打击比对食品工业大。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针对个别经济体而言，真正意义上大规模再分配结果都非常不同。

第三，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包括积极的、以指数增长为表现的，都不能自动成为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的判断指标。现实情况似乎相反：由于市场的非理性投机和金融部门严重脱离实际经济部门，事实上它们有时就表现为生产危机的诱因之一。

第四，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破坏伴随着就业率的下降，原则上也就自动伴随着失业率的上升。这种现象甚至在世界经济走出衰退的阶段还会持续。可以预计，2009—2010 年世界失业人口将会比 1 年半之前超出 6—8 亿。失业大军不仅在已经走出衰退或者仍然处于衰退的国家中继续壮大，在因各种原因避免了生产下滑的国家也同样会壮大。因此失业率不仅在美国和德国上升，在中国和印度也同样会上升。近 1/4 世纪以来美国甚至包括欧盟失业率的心理防线在 10% 左右。在波兰尽管表面上看该国在生产没有绝对下降的情况下渡过了危机阶段，但失业人口与 2008 年年初相比还是增加了 25 万。同样重要的是，就业市场的变化相当混乱，对一些行业的影响非常痛苦，远超整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导向的行业，以及建筑和汽车制造业。劳动力市场上

---

① 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这是所谓的“advanced economies”。

② 在 WB 和 IMF 的文件中这些国家被称为 developing economies，并且从 2004 年起被定义为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而 developing 和 emerging 之间的区别还不清楚。例如，巴西和印度被布雷顿森林组织看作是 developing countries，而全球投资者则将其称为 emerging Markets。反过来，波兰和俄罗斯在这些组织和金融市场的理解中则是一 emerging markets。

③ 同期，中国的人均 GDP (PPP 调整之后的) 相当于俄罗斯的 46%，相当于波兰的 39%，尽管 10 年前这一指标分别为 31% 和 23%。PPP 调整后的人均 GDP 一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参见 IMF Data Mapper, <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index.php>

正发生着激进的再分配，这不仅产生了经济影响，也带来社会后果。

第五，相当重要的是，当前的危机是基础性的危机。这不是市场经济激荡历史中简单的又一次既非“空前”也不“绝后”的危机，尽管它是危机情形特别生动有趣的一个典型。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而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上一代世界大部分地区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突变。如果情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仅仅是生产领域摆脱消极趋势，即从衰退底部反弹回到增长通道，还远非谈及危机结束的充分条件。

### 危机有可能避免吗？

我们经常要回应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当前这场危机有可能避免吗？如果就这么笼统地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它是找不到恰当答案的，因为被正确提出的问题必须指出我们可以应对危机的时间，即：在怎样的时间区间内这场危机是可以被避免的？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问题：不仅是“在什么时间”，而且是应该“如何”行动我们才能预防2008—2010年的这场危机？

在给予不同时间节点的条件：3年、13年和30年，有关避免危机可能性问题的回答会出现不同声音。这一三重角度的方法——3年、13年和30年的时间节点——可以在揭示这场危机的原因、机制和后果的同时，使其实质变得更显著、更清晰。不过，更重要的是，这对如何防止离我们3年、13年和30年的未来冲突中吸取教训和建议方面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我们必须明白，今天就是过去的未来。

很明显，世界危机在3年前就不可避免了。金融部门与创造生活必需品的实体经济及其商品和服务再生产过程的脱节程度如此之高，使得缩小差距的必要调整只能是休克性的危机调整。政策在危机之前所“不能为”的，应该在危机之后“有所为”。只是这样做的代价非常昂贵。

对经济活动基本价值观的破坏虽不是无处不在，但在经济相互依存之世界的许多环节，特别是目前仍然处于其中心的美国3年前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阶段，以至于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在现行体制下将经济带入无危机的发展道路。全球经济的不平衡规模实在太大了。这个世界本质上还是单一的封闭经济。不过，全球化虽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级的阶段<sup>①</sup>，世界经济仍然更多地被分割成近200个国民经济体，而

---

<sup>①</sup> 关于全球化的话题，请部分参见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cja*, PWN, Warszawa, 2004., Władysław Szymański, *Czy globalizacja musi być irracjonalna?*, Szkoła Główna Handlowa w Warszawie – Oficyna Wydawnicza, Warszawa, 2007. 从社会学的角度——Wnuk-Lipiński 2004 和 Staniszkis 2003.

非简单地由十几个不大的类似于发达的欧盟或者制度落后的独联体这样的一体化集团组成。

任何一个经济对以贸易赤字（相对更多）或者盈余（相对较少）为表现的外部不均衡都不陌生。如果忽略统计错误和特大损失，那么世界范围内盈余与赤字相抵，余额为零。但是，如果把所有账面上的贸易赤字和盈余的价值相加，然后计算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占比，那么2008年这一指标为6%<sup>①</sup>。在如此规模的结构均衡中怎会不摔跤？

而13年之前呢？在1996年能够避免本次危机的发生吗？这里的答案更复杂一些。那时在货币主义（而货币主义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和新凯恩斯主义之间有过激烈的辩论，而新凯恩斯主义现在似乎在很多领域正在经历“第二春”，尽管它并非是现代顽疾的灵丹妙药。在许多国家，比如中国或者斯洛文尼亚，都成功地完全阻止了新自由主义的攻击，而在其他国家这只是阶段性的，比如像印度或者1994—1997年间实施了“波兰战略”的波兰。相信了华盛顿共识或允许将其强加给自己的几个拉丁美洲的国家，不仅仅是巴西和阿根廷，被迫采取非常措施，并在后期才显现了积极效果。美国试图建立一个不同的经济运行与发展概念，英国也同样。然而，无论是民主党策动的所谓的“克林顿主义”，还是英国工党强行的“布莱尔主义”都无法应付新自由主义的风暴。作为主流，她压倒了一切：经济学、世纪之交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学。没有人驱逐扑向火焰的飞蛾。

那么30年前呢？那时有没有可能规避这场多重危机呢？当然可以。那时，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增强，且10年后吸收了后社会主义转型体制力量的条件下，仅仅是需要不站在新自由主义尚且不深的车辙之上，而是走在通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道路上即可。而后者的特点是强调增强社会凝聚力，并允许民营企业在国家公平配置生产率增长成果和提高资本效率的条件下蓬勃发展的一种经济体制，且一贯对自然人文环境及文化发展给予关注。然而由于挑衅性的贪婪和战无不胜的愚蠢，由于享有完善市场经济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相对疲软，再加上德国因统一、日本因结构危机的自顾不暇；以及由于所谓的新兴经济体相较世界其他地区更大程度上应该是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的部分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幼稚，使发展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由此应该能够对未来做出结论。能够这样做——意味着知识上有充分准备，且有政治意愿。不过，也无法保证一定因这个教训而受益。

---

<sup>①</sup> 这意味着，世界范围内贸易顺差和逆差总额约为5万亿美元，世界生产总值约78万亿美元（按照美元现行汇率计算）。

## 新自由主义是危机的根源

这场危机的根源深植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sup>①</sup>。他不可能出现在具有完善的社会市场经济的国家，比如堪的纳维亚国家，他只能出现在新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下。因为这种强烈的冲击只有在许多政治、社会、经济、技术等各种情况的机缘合力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如此交织在一起，使具有危机基因的现象和过程叠加，而这只可能出现在价值观、制度和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的经典结合下。

在将这一恶习誉为能够推动经济前进的美德时，这些价值观太过美化个人主义、颂扬贪婪，同时忽视经济活动的社会性，且不把人视为再生产过程的中心。在价值观领域，新自由主义几乎可以为一切融资，因为根据这一学说，只要有利可图，一切都值得交易，包括预期在内。

新自由主义在体制方面将国家及其监管实践视为头号公敌。它绝佳地利用大众传媒及公众舆论的操纵，还通过部分学届人士，特别是经济学家，将“小”国家、“弱”政府并最小化其对自发市场过程干扰的理念强加于世。而与此同时，政府却和市场一样，是现代经济的超级机构。只有能将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头脑协同起来的睿智才可能带来经济长期成功的机会。尤其是，但不仅仅是，在“新兴市场”国家，也部分地在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制度干预对现代资本主义而言是必然的，也是新自由主义因所信奉的价值观而拒绝接受的，不过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对某些集团利益的关切。

说到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它根本上混淆了目标和手段。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长期均衡发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方面，还涵盖社会和环境方面。而低通货膨胀率、正利率、平衡预算、快速私有化、浮动或者固定汇率、股票行情、低水平税收，这些仅仅是政策工具，不能使战略和经济政策服从于这些领域的指标、现象和过程。为了达到不惜牺牲大众以改善少数精英之物质状况的目的，新自由主义在其实施的政策中采用了诸如自由和民主、私有财产和企业家精神、竞争和经济自由等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然而，以 *pro publico bono*<sup>②</sup> 为幌子，利用它们牺牲大众来维护少数人

---

①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问题请参见Harvey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New York, 2005.)的出色研究。关于新自由主义作为危机的结构性根源 Żyżyński (Jerzy Żyżyński, *Neoliberalizm jako strukturalna przyczyna kryzysu a poszukiwanie dróg naprawy*, *Ekonomista*, nr 2, 2009. – 163–188 s.)有令人信服的论述。Orłowski (Witold M. Orłowski, *Świat, który oszalał, czyli poradnik na ciekawe czasy*, Agora, Warszawa, 2008.)和 Rosati (Dariusz Rosati, *Przyczyny i mechanizm kryzysu finansowego w USA*, *Ekonomista*, nr 3, 2009. -s. 315–351..)也研究了金融危机的原因。

② 译者注：拉丁语，意为公共利益。

的利益——这就是同一政策完全不同的两幅面孔。

即便如此，在世界经济目前的破坏程度下还不至于走向金融经济危机。扰动开始于严重的金融危机，且迅速蔓延到了生产领域，其降幅使很多国家进入崩溃阶段。现在危机正以湍流之势进入了社会领域，之后还会渗透入政治领域。而这一切正在慢慢叠加为第五个领域的危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领域。如此一来，危机便以轰鸣之势在全世界五个相互关联的领域翻滚开来：

——金融领域；

——生产领域；

——社会领域；

——政治领域；

——意识形态领域。

不过这并非不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因为该系统具有优异的、一再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适应能力。不久的将来也将会如此。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明确地认定新自由主义模式会崩溃。危机出现之前，它在任何新自由主义潮流占上风的地方都出色地操纵着舆论——从美国的里根时代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到90年代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强加给自己的拉美国家，再到叶利钦总统时代的俄罗斯及后社会主义体制转型初期波兰“只有休克没有治疗的”那个时刻。目前，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被提上议事日程，使其在做了整容和微调之后，不会再次将世界经济拖入自己的轨道。

新自由主义协助了独特的“经济赌场”之创立，其实质是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发端于70年代的分离过程在过去的这四分之一世纪内被特别强化了，并导致了投机性泡沫的空前膨胀。正是为了使巨大规模的投机成为可能，才创造了衍生工具，即所谓的金融衍生品，其世界金融市场总价值在2007年为600万亿美元，10倍于同期世界生产总值（GWP）的产出价值。

因此，当前的危机并不是由美国次贷市场的崩溃所引发的，这只不过是炸弹的导火索，而其能量则是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在病理关系不断积累的结果。用次贷市场的失败来转嫁危机责任的解释，这要么是新自由主义企图逃避致使世界危机发生的道德的、政治的和知识责任，要么就是只抓取表面现象。因为正是国家制度的逐步削弱和失控地、破坏性地脱离监管才导致了世界经济中非理性的生长，其结果就是危机。

因此早在3年前就不可能避免危机了。13年前的尝试也同样不够有力、不够连贯，不足以作出积极方向的改变。但在30年前，这样的发展是肯定可以避免的。由于这绝不是最后一次席卷全球的大危机，似乎从这个一般观察可以对未来下个基本结论：

危机还会发生。

总体而言，短期内现行财政、货币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回应是值得称赞的。在产能过剩增加的条件下增加经济的货币供应是正确的举措。从而借助非通胀货币对经济机制的润滑作用取得了积极成果。不过，这影响的还仅仅是危机的表现与后果。

### 发展三角：价值观—制度—政策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价值观应该取得从“有”到“是”的进展，而经济活动则应在更大程度上考虑到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发展目标也应该被重新理解。

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重建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所赖以运行的制度架构。目前现存的国际制度体系与其说有助于全球秩序，不如说催生了全球混乱。未来世界的经济，即相互关联的全球经济，需要的是能够进行包括政治在内的全球协调的制度。

考虑到不断变化的价值观以及在特殊文明旅程的这一阶段所出现的新目标，则无论是对政策实施的方法，还是其工具都应该换一种方式对待。重点应坚决地转向超国家协调的方向。

如果我们想避免重大危机的话，那么在未来势必要巧妙地移位至平衡社会、环境和经济的类似三角的均衡发展面。这一三角的顶点由价值观、制度和政策来确定。

只有源于正确的经济理论的那个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才可能是有效的。“合力”理论对于长期发展过程取决于什么的问题，回答得全面而非正统。

反过来，新实用主义是一种展现了如何根据该理论可以建设更美好未来的、规范的方法。“合力”理论的八个主要特征是：

- 1) 拒绝任何教条主义的精神束缚以及过分片面追寻特定问题答案的因素；
- 2) 拒绝盲从任何意识形态或者政治路线，但对客观真理的探寻也不会让步于“分歧的”与“共识的”真理；
- 3) 拒绝尝试创建万能的经济增长理论，转而关注与宏观经济再生产息息相关的现象及过程的具体特点；
- 4) 跨学科的方法，在经济推理过程中加入其他领域、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未来学，地理，法律，社会学，心理学，管理科学，互联网科学等的瑰宝；
- 5) 广泛使用经济分析的比较方法；
- 6) 转移到由特定历史、地理、文化、制度、政治、社会和问题维度组成的多维空间；
- 7) 将活动的目标与其实现手段区分开来；
- 8) 手段灵活善变，公开地用于为具体情况多方探寻各种适当的预防措施。



因此，我们需要实用主义，尽可能少的意识形态，尽可能多的实用主义。也可大胆地称其为“新实用主义”，因为它必须有赖于代表分析方法和理论方法的新视角。说它新还在于考虑到了有别于以前时代存在的、在全球化时代产生的新的经济运行条件。

合力理论一方面可普遍应用，另一方面可针对具体不同的发展挑战，只要方式适当，都将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务实行动的良好基础。

新实用主义因此对这一理论而言具有话语性特征。这里，实质上指的是非正统的经济理论，甚至更宽泛一些，指的是在宏观经济和社会范围内，实质上是全球范围内以实践、政治、广义的全球发展战略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理论。

即便如此，新实用主义仍是对国家干预必要性的合乎逻辑的延伸理解。这一方法不在于对再生产过程的干扰，而是要理智地操控其状况。这应该是一种现代的、制度性的，而非随行就市的干涉主义。我之所以没有把新干涉主义作为一个特点单列出来，是因为它应该“穿越”上述8个特征，并合理地依据它们。

这是除在本次危机中名誉扫地的新自由主义潮流之外的原则性抉择。但为了使这一潮流被彻底地扔进历史的垃圾场，必须推出一个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被接受的、替代它的东西。而这正是“合力”理论和新实用主义的作用所在。

(刘军梅 译)

---

**【Abstract】** 2008-2010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was not simply trigger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U.S. subprime mortgage market, but is rooted in neo-liberal capitalism.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does not so much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 order, but rather gives birth to the global turmoil. There should be a fundament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an increasingly interdependent world economy. The future of world economy, that is interconnected global economy, requires the ability to promote global coordination includ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Аннотация】**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и финансовый кризис 2008-2010 гг. был не просто вызван развалом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рынка товаров низкого качества, а скорее причины данного кризиса коренятся в неолиберальном капитализме. Существующая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истема не столько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мировому порядку, сколько порождает глобальный хаос. Необходимо коренным образом реконструировать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рамки всё более взаимозависимой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Будущее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ли иными словами, взаимозависимой глобаль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требу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включ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Key Words】** Neo-liberalism, economic crisis, Theory of conjunctures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Неолиберализ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теория стечения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развития

---

(责任编辑 郑润宇)